

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若干思考*

崔立如

[内容提要]对中国外交而言,国际关系正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变,中国自身及其与外部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开创中国模式,日益与世界融合,并被视为变化着的世界中最重要的变量。身处这一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在自我角色定位、战略姿态和中长期目标等方面实现重大转进和提升。中国未来国际战略要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大势,找准自身定位,以新观念、大思路谋篇布局、应对挑战,以宏大战略视野、超越性思维,实现具有创立中国和平发展范式意义的战略转进。

[关键词]中国 国际战略 和平发展范式

[作者介绍]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及国际战略研究。

未来十年中国的国际战略可以说就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和政策。从国际战略角度讲,未来十年中国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大体可以概括为: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大趋势,找准自身定位,以新观念、大思路谋篇布局、应对挑战,以我为主,扬长避短,用开创性思维破解难题。

一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转变。一是世界力量格局演变进入多极时代。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新兴经济体,美欧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主导地位大大削弱,世界上出现了更多的力量中心、决策中心和行动中心;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东移,权力重新分配。二是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益深化的相互依赖,它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竞争与合作交织,形成一种竞合(co-opetition)关系。三是世界发展严重失衡,这在全球、地区和国家等三个层面皆有表

现,而从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看,则表现为新旧矛盾叠加、交织、加剧,局部动荡此起彼伏,热点问题频出。恐怖主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这种失衡的一种反动。四是安全问题呈现前所未有的广泛化、复杂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且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交织。五是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而紧迫的议题。六是国际政治呈现越来越多的社会性特点。非国家行为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社会信息化加快推进,明显改变着传统国家政治生态和国家间政治的特性。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改革和重组国际体系的进程已经开始。

“复杂性”是认识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概念,它比以往具有更深刻的含义,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状态的描述,更是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特征的表现。认识这种本质特征的重要性如同我们认识“人的复杂性”,它包含前所

* 此文主要内容源于作者最近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2011复旦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未有的多元性、多样性、相互关联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同质或异质国家、决定国家关系的政治属性和亲疏,已经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

对中国外交而言,与以往处境最大的不同还不是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是中国自身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变化。中国历经 30 多年改革开放,主动与世界融合,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开创中国模式,已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日益被视为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最重要的变量。我们观察、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发展变化时,再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冷眼向洋看世界”,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局中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之一。处在重要历史转换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在自我角色定位、战略姿态和中长期目标等方面实现重大转进和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的自我国际定位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国,并以此规定自己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和外交作为。今天,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利益和影响已经遍及世界各个地区。有关地区和全球事务的重大决定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成为国际上认定的中国身份标签。身份的多重性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国际角色的特点,而“日益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外交的主要角色定位;应当继续不当头,不扛旗,但必要的领导性或引导性作用不应回避,而且这也是创立一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范式所需要的。在这两年的外交事务中,中国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已经发生,而更明确地以此作为顶层战略设计定位并增强其宏观指导性的自觉意识,对提升中国外交战略的主动性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上述大变局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展开的历史时期。对这一大变局,我们可以做两个大判断:一是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二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在此期间,一方面

是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另一方面是包括所有大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面临政治经济变革的重大挑战,或经历转型的困难过渡期。重建平衡、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以及动荡和不确定性,交叉构成国际形势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不可避免地带来外部关系的某种紧张和矛盾冲突的加剧,中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会有意无意地被国际社会渲染、放大,甚至更容易被作为争端的“主要矛盾方面”。“中国威胁论”难免会被以各种方式不断炒作,进而会影响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中国的国际战略,必须对这一形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必须紧紧扣住“转变”这个关键词,必须以新的视角和站位来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创造性的思考、运筹并以之处置实际问题。

中国如要保持外交战略的主动,就必须站得更高,想得更大,看得更远。中国的外交要求全球视野,高屋建瓴,中国变大,地球变小,并要求提升中国的国际战略定位,加强战略设计的前瞻性、系统性。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必须积极树立的形象。中国要分清战略定位和外交姿态的区别,在需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时应当仁不让,与他方交往言行举止、处事态度则要理性谦和。就此而言,“谦虚谨慎”的提法比“韬光养晦”提法更为适当。

近年来,中国外交上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意识明显增强,但要实现具有创立中国和平发展外交范式意义的战略转进,尚需要更宏大的战略视野和超越性思维。“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是中国近十年外交上的一条重要提法。未来十年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应该超越“机遇期”提法。所谓机遇期是借用西方“机会窗口”的概念,指总体国际形势对中国较为有利的一段时期。“机者,动之微”也,指事态发展萌动之时。即使称为“机遇期”,时间也不能太长。长期的“机遇”其实就是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未来十年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两者都不确定,并且可以相互转化,这就使“形势更加复杂”,包含着中国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从全球化、多极化和中国崛起带来的世界政治结构性变化的视角,用更具先导性和战略主动性的思维方式,认识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形态及其带来

的“多种可能性”,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拥有深邃思想和开创性品质的基础。

三

根据以上认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外交战略思考需要从模糊走向清晰,在哲学理念和务实行动之间搭建更为清楚的战略思想、观念、主张、学说、理论、目标和路径的连接。建立在和平发展理念基础上的中国外交大战略,要求具有内外之间的思想统一性,这是在决策和行动的相关范围内,在外交战略的目标、方针和政策上形成统一认识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内进行更加有效的舆论引导、对外进行更有说服力的政策宣示和沟通的必要条件。要适应当今多元化、信息化社会的要求,增强政府统领性,以利于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与此同时,对国际战略思想和基本目标充分的公开宣示也必不可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战略首先要厚植战略根基,强化战略内生力。中国外交战略的思想和逻辑基础来自和平发展的基本理论。国际战略的根基在国内,在于和平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强大的内生力来自中国自身的特有条件: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众多而极其勤奋的人民,悠久灿烂且具有包容力的文化,日益增强的实力地位和民族自信心,以及较强决策力和执行力的国家体制。中国不断增强的内生性动力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未来十年中国国际战略的厚实根基。发展与安全两大战略并驾齐驱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特点,“发展是硬道理”从中国走向世界,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问题的背景下,要坚持发展战略的主轴地位,安全战略就要有更系统的设计和更有力的措施,以求能为发展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要求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安全战略两条腿都要坚强有力。长期以来,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比,中国国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研究明显偏弱。在相关领导层和工作部门中,政治学知识普遍缺乏,安全意识多停留在一些原则和空泛的概念上,过分相信经济因素对政治问题的影响,或习惯于用“以经促政”的思路应对、搁置

政治难题。这种情况与国内改革进程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先行有重要关系,也与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弱到较强的发展过程有关系。现在则到了必须转变认识,加强国际战略的政治与安全战略顶层设计的时候。过去中国实力地位明显弱势时,西方强国对华关系中政治和战略的博弈性处于相对较低的程度。现在的形势大大改变,而中国外交由于缺乏全面清晰的顶层政治、安全战略设计,难以形成应对激烈博弈局面必需的内部强有力的统筹协调,容易发生顾此失彼、甚至为局部利益而损害大局的情况。

此外,中国外交战略还要明确战略重点,发挥战略优势。中国身处亚洲,作为中国外交“首要”的亚洲战略,需要进一步提升,使之上升为中国国际战略的中心。亚洲已成为全球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枢,我们应下大力气全方位开创中国-亚洲新纪元。要充分发挥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相邻区域潜力,使国家作用与市场功能相配合,使中国沿边省区地方经济与周边国家自然联通合作关系。经营亚洲战略需要中国更清醒地认识两方面问题:一是防止伴随中国迅速崛起而产生膨胀心态,出现急功近利的倾向,尤其要防止只顾追求一时和单方面效益而忽略统筹兼顾;二是亚洲国家,尤其是邻国对中国日益强大喜忧参半,既希望受惠,又存在防范心态。中国发展周边关系、开展合作要着眼长远,以亲和力争取人心,努力消除各方疑虑。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互动的历史性产物,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属性要求中国外交战略能够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并在一定意义上包含着一种期望:中国和平发展的实现过程也是一种新的大国和平崛起的外交范式形成过程。或者也可以讲,中国和平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需要一种基于其内生性动力而又能适应现实国际关系,即能真正反映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范式的创建。这可能表现为由追随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外交战略,逐步向贴近积极的建构主义思想和目标方向演进的创新性范式形成的过程。随着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此应有更加深思熟虑的战略自觉。○ (责任编辑:黄丽梅)

